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一期 ——  
(二〇〇七年五月七日报出)

---

本期目录 (zk0705a)

【人物春秋】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	东平·王凡
【往事回首】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陈大斌
【回首文革】“文革”中一次重要的农村工作会议	李静萍
【读史札记】九一三的谎言与费四金的诚实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读书随笔	书 吃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人物春秋】

### 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

• 东平·王凡 •

#### ◇ 从康生的一句话，到走访徐明清

1975年秋，重病缠身的康生，已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当王海容和唐闻生前去看望病重中的康生时，他说有重要情况要转告毛主席，康生说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观澜（徐明清的丈夫）、徐明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清理江青档案时，发现有一份延安时期徐明清为江青写的证明材料，有关部门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互相包庇，徐明清被捕入狱。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以10号文件的形式，对徐明清和江青的关系加以定性。在这个“红头文件”定性之下，徐明清被关押到秦城监狱，坐了两年多冤狱。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大潮下，徐明清才被释放出

狱。后由党组织为她彻底平反，撤销其叛徒罪名，重新澄清了她与江青的关系。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中共高干的夫人以真名和笔名陆续出版了多本有关江青的传记：《江青野史》、《女皇梦——江青外传》、《江青秘传》、《无冕女皇》，其中都把徐明清污蔑成叛徒、与江青关系紧密的死党，使徐明清的声名再蒙阴影，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让晚年的徐明清再度遭受到极大伤害，被迫与那位作者对簿公堂。

那么，徐明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早年是怎样与江青结识的？她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数十年曲折的人生历程中，她们各自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为此，我们曾专程来到徐明清的寓所，拜访了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听她讲述自己那漫长坎坷的人生历程。

#### ◇ 在“晨更工学团”初识江青

1911年5月，徐明清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山区的一户普通农家。小学毕业后，徐明清考入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又转为共产党员。

1928年，徐明清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成为陶行知门下一名得意弟子。

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日本。徐明清辗转于江苏、安徽和她的家乡，在各地开办小学和妇女识字班。

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以及农民、工人、店员识字班。

当时，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在后来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这里。

徐明清记得，一天，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

徐明清那时的名字叫徐一冰，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但政治上却比江青成熟得多。

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晨更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会唱歌、演戏，“晨更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徐明清就把江青留了下来。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店员识字、读书。

当时“晨更工学团”里的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下。小阁楼上只有一扇窗，没有床，三个姑娘在地板上铺了草席就可以睡觉。

三个女教员的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徐明清和江青都称呼“宁波李”。

## ◇ 江青的身世和来由之谜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相处得不错。

可是一回到小阁楼里，江青往往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直接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收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了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关心，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但徐明清仍记得，那封信的开头称呼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虽然时隔70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记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徐明清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当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劝慰了江青一阵，要她不要过分担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当时徐明清对江青的身世和来“晨更工学团”前的经历并不清楚，后来才知晓了这些。

1914年，江青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上小学时，校长给她取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江青的母亲带着12岁的女儿投奔亲戚，后随亲戚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江青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物理系的一个19岁男生，走进了江青的视野，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请愿，成为青岛学运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

部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熟悉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并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后，田汉让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也同意了。于是，才有了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工学团”的一幕。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俞启威。俞启威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找江青。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她们暂时有个栖身之所。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工学团”教课。

#### ◇ 兆丰公园，江青遭遇第一次被捕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工学团”，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经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人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街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乐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乐”，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在俞启威突然被捕时，是阿乐帮助江青逃出青岛，送上船的。

他乡遇故知。形单影孤的江青见到阿乐自然非常兴奋。她当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此时阿乐担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此后，他们有了比较多的往来。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请阿乐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两人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然而这时，阿乐已被特务跟踪。

兆丰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后，发觉有人跟踪，知道情况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开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

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进入租界，甩掉了特务。

江青没有阿乐那么幸运，被特务在另一个大门口截住，从而被捕。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学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冬，江青得以释放。

◇ 徐明清带出狱后不久的江青回到浙江老家，并为她看病

江青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俞启威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原来俞启威从北平又回到上海，住在亲戚家里，江青也暂住那里。俞启威在信中说，江青出狱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亲戚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组织上征求意见，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俞启威的亲戚家。在那里，徐明清见到了俞启威和江青。当时江青无处落脚，无奈之下只得在这里借住。

徐明清见到江青时，发现她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正在发低烧，脸色很难看，还有点神经质，说话声音忽高忽低，时快时慢。显然，她是在狱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点不大正常。因刚刚被保释，她还得定期向警察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电报，母亲病重。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亲。组织上说，你把李云鹤也带上吧，避一避风头。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了上海。走的那天，俞启威到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的父亲是位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徐明清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病。

徐明清的父亲给江青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病，要徐明清到县城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江青的身体康复很快。

在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步，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候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很快恢复起来。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去了北平。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很愉快，便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县。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 因叛徒出卖，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

以防万一，徐明清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作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带着上海市警察局的人来到徐明清的住处。就这样，徐明清被押走了。

徐明清被押解到警察局后，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党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在陶行知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受到严重摧残，她的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次回到上海。

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他们告诉徐明清，现在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委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已决定派四名同志前往那里工作，徐明清也在其中。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第三次来上海后，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结婚，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回到上海后，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复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以自杀殉情，后被救。江青在此之后返回济南，两人遂携手返回上海。

因为不断看到有关江青的传闻，徐明清很是困惑：“一年多没见，难道江青的生活真的变得如此快？”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江青的家。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还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一辆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员们话别。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也许“名演员”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徐明清仔细一看，认出她就是江青。可江青此时的样子和徐明清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她非常瘦，而且脸色蜡黄，根本不像一个正走红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儿？”江青问道。

“我去西北。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见面了！”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黄瘦的模样，徐明清随后特意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谁知江青听了她的话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真是一言难尽啊！”

◇ 博古批准了江青去延安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同志已经被捕。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徐明”。

西安事变后，徐明清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女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后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徐明清遂让江青先在幼稚园住下，并询问她将来的打算。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里面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正在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颖超。江青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夫人朱仲芷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写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 按组织要求，徐明清为江青写证明材料

1937年9月中旬，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也离开西安，和10多位干部一道，步行了10多天，到达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报到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王观澜。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由于同乡之情，又志同道合，两人经常交往谈心，越走越近。1937年底，徐明清和



王观澜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等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是请客人们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顿饭。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徐明清说，有的书中说她是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的，那真是无稽之谈。她来延安是组织调动的，来延安时介绍信上的名字还写的是徐明，只是因为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有个重名的男学员，她才改名“徐明清”的。

徐明清到延安后不久，江青来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她。当时组织上派江青到农村搞调查，她从农村调查回来后，还给徐明清念过一首打油诗：“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来形容当时延安生活条件之艰苦。江青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到生活艰苦的延安，并下到农村锻炼，表现还算不错。

后来，江青要求到抗大学习。她在自己写的材料中说明，她本人于1933年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却没有党的组织介绍关系和证明人材料。因此，组织上要对她作进一步审查。

当时，中央组织部为证实江青的党籍问题，要求接触过她的人写出证明材料。组织上曾找过徐明清和其他人，请他们各自写出证实江青情况的材料。徐明清说，她是当时为江青写证明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与江青的认识和接触情况，如实地写了一份材料。这个证明材料证明了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证明她曾参加过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证明她参加过共青团，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但在徐明清和江青接触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江青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这份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及江青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是一名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之类的文字。

这份材料被存入了江青的档案。没想到若干年后，这份材料竟成了指控徐明清包庇江青混入延安、混入党内的凭据，并因此让她坐了两年多的冤狱。

那么江青在延安何以恢复了党籍，这其中又有什么内情呢？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入党介绍人是黄敬（即俞启威）。于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黄敬是江青入党的第一权威证明人，而且黄敬当时已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证明材料，应是很有分量的。

#### ◇ 王观澜夫妇受邀参加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宴”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

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次了解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向组织交谈的内容，与她为江青写过的证明材料大体上相差不多，但她还是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所听说的江青在上海时的那些事。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抗大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

叶子龙后来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在第二次被邀请者之列。

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建国后，江青一直以领袖夫人自居，养病赋闲，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王观澜夫妇再不能像延安时那样，可以经常出入毛泽东、江青的住处，一起聊天谈心了。

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成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徐明清则因在1935年4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不容她阐明、申辩。1972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此后，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但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她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她希望江青能如实作证，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想是江青没收到，于6月19日又写了一封，但依然石沉大海。到了11月份，徐明清再次提起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作证。

然而，徐明清的希望还是破灭了，江青对她的请求根本未置一词。徐明清的家人说，以当年徐明清曾照顾过落魄时的江青这种关系，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几封信，却不予理睬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结果，在“文革”那一段惨痛的日子里，徐明清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 江青档案里的证明材料，成了徐明清入冤狱的祸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然而，让徐明清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会于此际突遇大祸，蒙受了一场更为不堪的冤屈。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的档案材料中发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历史问题，无法作出揭发。她的态度是，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不顾事实去造谣捏造。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正式逮捕，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

徐明清写下的材料，被审讯人员认为是“客观主义”，不老实，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不吃敬酒吃罚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审讯人员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白天黑夜不让她睡觉。如此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巨大的政治压力，折磨得徐明清头脑晕痛，握笔颤抖，几乎神经错乱。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两个多月后，她写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正是这样的一份中央文件，让徐明清的名誉扫地，蒙受冤狱，而且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 14年后，徐明清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的老同志不断为徐明清鸣冤。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20多个

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帮”首犯江青，且她所写的材料还上了“红头”文件，所以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要由中央组织部重新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对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委托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的历史结论作复查。农业部党组组织专人作了大量的内调外查，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搞清了历史真相，推翻了江青专案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来的所谓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其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就此，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因江青问题蒙冤，徐明清度过了14年漫长的艰难日子。

在采访中，徐明清很坦率地谈到了对江青的看法。她说，最初，江青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道路。她到上海“晨更工学团”工作时，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表现可以。而后来，江青进入上海戏剧、电影界，明显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和生活问题……再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致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人是会变的，江青的一生也有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回顾徐明清所经的磨难，让笔者深切感到：为实事求是，许多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徐明清老人心怀坦荡，一身清白，坚持说真话，不跟风，即使在监狱里，哪怕是对有罪的江青，也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表现出了极其难得、极其少见的高贵品质和人格力量。她是值得人们尊敬和钦佩的。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王观澜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曾亲自到医院，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让你受苦了！”徐明清与胡耀邦紧紧握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胡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 《党史博览》2007年第3期

~~~~~

【往事回首】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 陈大斌 •

33年前，也就是1974年6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评法批儒”之名，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种种丑行令人不齿。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也在一些朋友中“传播”过。近年来，有些当年曾耳闻过此事的人，建议我把当时的现场见闻写出来，让“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小插曲有更多的人知道。但当时对江青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内参”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所以现在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也非易事。2003年夏天，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我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查看了一些资料，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核实了有关史实，遂写下这篇追忆文字。

#### ◇ “批林批孔”：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

1974年新年伊始，“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便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他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4年1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江青等人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作反党反革命文章。1974年1月，江青赤膊上阵，在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家机关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大放厥词，公然影射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点名攻击一批中央及军队领导干部，还说中央有“很大的儒”，叫嚣要批“现在的儒”。同时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煽动揪斗老干部，批判斗争教育界、文化界的一批人。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时间全国形势紧张起来。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上访团，拉山头、打派仗，有些人竟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工停产，致使全国各地大乱，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8年，全党全国人心思定。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我所在的新华社大多数人对江青的言行极为反感，对“批林批孔”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是抵制态度。当时我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做新闻采编工作，也很不理解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对江青等人的言行非常厌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大寨“蹲点”，为期一年。春节过后，我们便钻进太行山里，“蹲”了半年时间，这年6月，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分社的同志说，这样在一个地方死“蹲”下去，不如到各地走走看看。6月中旬我们去了晋东南地区，参观了李顺达领导的平顺县西沟大队等老先进典型。在平顺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红旗渠”引的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林县属河南省，但与平顺山水相连。我们便请示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要去林县看看“红旗渠”工程。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同意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我们两人从平顺翻过太行山来到河南林县，参观了“红旗渠”工程，于6月19日乘车回北京。

6月20日我们到北京后，上午到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办公室，与组里的同志们闲聊了一会，农村组组长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通知我，快去社总编室报到，有重要采访任务。原来新华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新华社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立即赶往天津。国内部决定，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大姐，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穆青在办公室里见了我们四人，他什么任务也没有说，只是让我们马上出发，后勤部门的车已经在楼下待命。上午10时许，我们四人挤进一辆轿车赶赴天津。

我们不知道要到天津什么地方，司机也不熟悉天津市的道路，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

一辆灰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等待我们。天津市来迎接我们的一位干部说，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至于上哪儿，去干什么，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后来我们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的招待所。这时已经是午后，他安排我们吃了饭，住下来，并嘱咐我们：就在房间休息等待，不要外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要我们来做什么？弄得如此神秘！一直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人理睬我们。晚饭后才见到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朱波匆匆赶来。他对我们说，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还要去农村听农民“评法批儒”。她通过中央办公厅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要搞天津工人、农民的“批林批孔”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里好不懊恼！在太行山里“蹲”得好好的，谁让你出来看什么“红旗渠”？看就看吧，谁让你又跑回北京来？这不是自己往漩涡里跳吗？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城乡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党活动。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天津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为工厂企业开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在市委一些人的鼓动下，天津站组织工人参加，于当年5月编写出一部《儒法斗争简史讲稿》。江青于6月16日得知这一情况，只隔了一天，即6月18日，就带上迟群、于会泳等亲信，还有北大清华写作班子（“梁效”）等急匆匆来到天津，声称要听取天津站工人的宣讲。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发表了“六一九讲话”，大讲“儒法斗争史”。她不懂装懂，胡拉乱扯，说“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她把从秦汉时代到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统统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儒法斗争”，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儒家”。同时，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江青批发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总印数达78万份。

在抓天津站这个“点”的同时，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宝坻县的一个大队——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这个大队原为天津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先进典型。6月22日，江青在小靳庄当场宣布：小靳庄是我的“点”！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并派来她的联络员进驻，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大肆进行反党活动，散布大量反党谬论，流毒全国。

笔者只经历了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的情景。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洼庄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口号是“河挖三尺，地高一寸”，不断提高了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全队以农业为主，除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大蒜等经济作物，有数口鱼塘养鱼，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不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见了生人不敢说话。小靳庄的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是热心文化活动。不少人能说会唱，会编顺口溜，敢于当众登台朗诵、演唱。村里有个评剧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戏，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会演，还得过奖。多年来一直是全县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

◇ “评法批儒”：篡党夺权野心毕露

我们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两人于1974年6月21日中午赶到小靳庄。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经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任务。大队长等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凑稿子，准备“评法批儒”汇报会。一般社员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来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江青于6月21日下午从天津出发，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家属的门。女主人热情欢迎她，她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悄悄地告诉她，这家女主人可能患过肝炎。江青立时变了脸，站起身来快步逃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送客的主人在后边小跑着都赶不上她。江青逃也似的回到火车后，再没下火车。

6月22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50里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市里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江青开道，硬是把泥泞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这样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我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亲见亲闻了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

上午10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她叫嚣：“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无遗。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福兰告诉了她，江青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道：“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说，“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的这些话使人很容易想到她要“克”的是那个“周”。之后，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说，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

芳。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事先认真准备了个发言稿，可是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把手一挥：“净是什么龙啊凤啊，改！就叫李树凤！树立新风！”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丑行上演。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可是在这种场合，经过江青与他的如此“配合”，给人造成的感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当场不少人惊得“瞠目结舌”！事后有人问我此事确否？我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千真万确！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社员的“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江青说她要 go 地里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割麦子。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不少社员正在收割小麦。

江青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来到麦地里，拿过一把镰刀要割小麦。可是她既不会使镰刀，也抓不住麦棵，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有割下来。其实她真实的目的并不是割麦，而是让随行的记者照相，老实的大队支书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了自己的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了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俩叫来见江青。在麦地里，有人把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了，一直想念着你们啊！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说，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 1942 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我。今天我送给你们俩做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的是真话吗？看那顶草帽，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顶很精致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致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战火硝烟，30 余年过去了，还能保持如此崭新吗？再说，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谁来戴呢？这不是在演戏吗？！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很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是想戴上照相。可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之后，见上面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接着又埋怨起侯隽说，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院上，有人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说，这麦子多好啊！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口袋，装上 10 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了一圈，就宣布“收麦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江青等人在一间教室里摆开餐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荫下吃饭。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事先已接到通知，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作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人口少，房子宽敞，环境也较干净。县里村里前一天已派人帮王家来了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重新扫过大炕，屋里屋外全消毒了，炕上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服务员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遮住王家前后窗户。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江青午休。江青进去后，王家几口人全走出来在院子里等候。大队干部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为江青站岗放哨。这就是江青的与农民“同住”！

#### ◇ 语重心长：纪登奎有胆有识

作为记者，那天中午我只吃了一块面包，就忙起来，生怕漏掉重要活动。我跑到小学校里，只见迟群、刘庆棠等人正围着桌子起劲地甩扑克，没有一个人肯到村里走走，看看农村农家生活，去和农民说句话。只有同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没有午休，也没去打牌，他把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找来，两人蹲在村头小树林里说话。王作山忙了一上午，情绪兴奋又紧张，满头大汗，也没工夫回家吃午饭。纪登奎说，我知道你没吃上饭，给你拿来个面包，还有西瓜，先垫垫吧！见我来了，纪登奎说，记者同志也坐坐吧，咱们随便聊聊。那个中午，他们大概聊了一个多钟头。先是王作山详细汇报了大队的生产情况，纪登奎也说了不少话。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后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了。你们的确有很多优点、长处。可作为农村，不管是谁的点，今后主要任务还是种好地。要踏踏实实学好大寨经验，继续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还说，生产上光种粮食不行，除了大蒜，可否种点棉花？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农村工作的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天津一行，使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纪登奎。这次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这个中午他与王作山语重心长地谈话；二是我听天津的同志说：1974年6月19日那天，江青在全市“评法批儒”大会上大放厥词之后，曾让纪登奎讲话，他当时只讲了短短的几句，大意是：毛主席曾经批评一些人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祖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的历史知识很少，但我不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人。我是深以为耻的！今后要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历史知识。

在那样的特殊年月里，那样的场合，当着不可一世的江青，他不投其所好，却讲出这样一番话，应当说是胆识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有关纪登奎与小靳庄颇为有趣的插曲，不妨在此一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一次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有一天我刚吃完饭从食堂走出来，回头一看，见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与纪登奎并肩走来。吴象见到我，就喊道，快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纪登奎，现在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

自从被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纪登奎已经几年未曾公开露面。不久前中央刚分配他这项新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以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我上前与之握手、问候，回过头来，吴象又要向他介绍我。可没等吴象开口，纪登奎就打断了他，

说：“你先别说，这位我认识，肯定认识！我们一块工作过。你让我想想……”他拍着脑袋，苦苦思索，却一时想不出来。我忙上前对他说：“是在小靳庄。”他一听，使劲一拍大腿，哈哈大笑：“对了，对了！咱们在小靳庄一起工作过！你是新华社的，那天你们去了两位同志，那一位也是个年轻人，个子不矮。”人们都说纪登奎没有官架子，记忆力特强。这次真地见识了。我说：“你说得对，记得准！”

纪登奎哈哈笑着，拉起我的手，若有所思，走了几步，对我说道，那次在天津，江青简直是猖狂之极！在小靳庄又闹了个一塌糊涂！

我说，是的，那天你与他们截然不同。

纪登奎看了看吴象，又看了看我，说：“老陈，你说说那天的情况，说说我那天的表现怎么样？”

我想起当年的情景，尤其是树荫下他与王作山的谈话，由衷地说：“我很佩服那天你的谈话。江青他们在丑恶表演，搞阴谋。而你对王作山说了许多知心话，语重心长！”

纪登奎高兴地笑着，天真地像个孩童。

1975年6月22日下午3时许，江青睡了两个小时后起床，乘车离开了小靳庄。至此，江青一访小靳庄的闹剧落幕。

但这场连续剧还没有结束。这年9月，江青陪着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丽姆达二下小靳庄，又有许多丑恶表演，还弄出一种不土不洋的大袍子“江青服”，一下子成了许多城市里时髦女性的“时装”。1976年9月，毛泽东病重期间，江青又率领一帮亲信，三下小靳庄，猖狂进行反党活动，又演出许多丑行。不过，后两次我都不在现场，虽有耳闻，没有亲见，期望现场亲见的人也能写出来。

□ 《百年潮》2007年第3期

~~~~~

## 【回首文革】

### “文革”中一次重要的农村工作会议

• 李静萍 •

1970年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在“文革”初期举国动荡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中共九大之后国内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愈合内乱创伤的形势下召开的旨在稳定农村形势，促进农业生产的一次重要会议。

#### ◇ 会议背景

从政治形势来看，“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的1970年，并没有像人们盼望的那样“胜利结束”，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做法继续盛行、泛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斗、批、改”运动包括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仍然接连不断。“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北方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召开的。

从经济形势来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在全国人口急剧增长和粮食生产持续滑坡，供求矛盾日益凸现的情况下召开的。1965至1969年间，我国人口急速增长，由1965年的7.25亿增长到1969年的8.07亿。人口的增长给基础薄弱的粮食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1966年到1969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生猪饲养量等都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全国农业总产值，1966年为640.9亿元，1967年为651.3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6%；1968年下降为634.5亿元，1969年上升为641.8亿元，也只比1966年增长了0.1%。全国粮食总产量，1966年为21400万吨，1967年为21782万吨，比1966年略有增产；1968年减少为20906万吨，比1966年下降2.3%；1969年略有回升，达到21097万吨，但也只为1966年水平的98.6%。（1）一方面是人口的骤增，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滑坡和停滞，给混乱的中国埋下了“手中缺粮，心中发慌”的潜在危机。

从农村工作方面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严重偏向的情况下举行的。“文革”开始后，大寨由原来自力更生的生产典型嬗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政治典型，主要经验也被主流媒体宣称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寨一些“左”的做法被当作正确经验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比如，大寨“自报公议”的评分记工法经过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两次“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的首肯和推广后，到1968年，山西、山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制度的社队已占全部社队的半数以上。（2）大寨实行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昔阳县1967年上半年开始推广，翌年年底，已全部完成过渡。（3）据统计，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70年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占大队总数的比例骤升到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1/4的社队实行了大队所有制。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各地也纷纷效仿，有些地方将原来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7%减少到5%，有些地区，比如昔阳等县，则干脆将社员的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统一经营。大寨这些“左”的做法的宣传和推广，实际上是对包括《农业六十条》在内的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基本政策的否定，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 会议过程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筹备工作从6月初开始。6月2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京、津、晋、冀、鲁、内蒙古、豫、辽、陕、甘等北方10省、市、区农业会议，促进粮食生产上“纲要”的问题。说是10省，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考虑到青海、宁夏、江苏、安徽四省区的情况和要求，又同意这四省参加会议。这样，原本计划的十省农业会议就变成了14省农业会议。而参加本次会议的远不止14个省，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以及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各部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59人，其中北方14省的代表940人，有省、市、县的代表，也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代表，甚至还有支农各行业的代表。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之前，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一行还专程亲临昔阳县考察。在为期两天的行程中，纪登奎不仅视察了大寨、城关、安坪、界都、洪水、皋落等7个公社，武家坪、厚庄、南埡、石坪、西固壁等9个大队，还看了一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这些都是为召开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做准备和定基调的。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两易其地。1970年8月25日，先在昔阳举行，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主持会议，8月31日又移至北京。为期41天的会议，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第二阶段（9月1日至9月13日）主要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展开学大寨的问题；第三阶段（9月14日至10月5日）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

#### ◇ 会议的主要内容

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主旨是通过学习和推广大寨与昔阳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改变北方地区在农业生产上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迅速扭转“南粮北调”局面。这原本是中央察觉和改变“文革”初期的混乱状况、恢复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一次努力，但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和左倾思潮仍然十分严重，并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这次会议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复杂多变之中。

这种矛盾和多变性，首先表现在以9月14日转入第三阶段为标志，会议实际上分为前后内容迥异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二阶段的参观和“革命大批判”、“路线分析”中，代表们紧跟当时政治形势，对“三自一包”等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猛烈批判，强调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提出要解决农村干部中所谓“五种人”掌权的问题。<sup>〔4〕</sup>会议进入第三阶段，代表们在分组讨论实现《纲要》的措施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中，纷纷要求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认为《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应稳定不变；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应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反对“工分挂帅”，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做法；要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给生产队一些自主权。显然，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的意见构成了对前两个阶段会议内容的改变，成为会议的主流。

《人民日报》9月23日发表的社论《农业学大寨》和10月5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之中。社论一方面充斥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搞好斗、批、改”之类的时尚语，另一方面，在回答“学大寨学什么”这个“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时，社论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東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東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肯定是学不好的。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做法，还有可能‘学歪了’。”《报告》也在“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的豪迈言辞下，把大寨经验和经营管理中的一些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在论及党的农村政策时，《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动；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要制止随意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和物资等。指出“凡是关系到当前人民公社重要政策变动，都必须实现请示报告，各地不能擅自行动”，强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反对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等。

#### ◇ 会议的积极作用

北方农业会议虽然也因时应势参观了大寨和昔阳，进行了“革命大批判”，沿用了“大批促大干”等“左”的口号，但最后还是落脚到了坚持《农业六十条》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上。由于社论和《报告》将大寨的“根本经验”与“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并将后者定位于“第

二位”，这就在实际上降低了大寨具体做法和经验的普遍意义，给广大农村干部坚持正确的政策和抵制当时仍有很大影响力的“左”倾思想留下了相当空间。会议无论对当时还是以后稳定全国农村形势、推动农业生产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重申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为在农业领域和其他领域抵制“文革”前期的极左思潮和一系列“左”的做法提供了突破口和空间。以后，九届二中全会发动的“批陈整风”，批判陈伯达在各个方面的“左”的做法，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各项政策，实际上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期主导精神的继续。1975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对农业工作的领导仍然是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坚持《农业六十条》为依据的。而且，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业领域，与后来的工业领域坚持《七十条》、科技领域坚持《四十条》等反“左”斗争连为一体，成为党内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内容。

其次，对稳定农民的思想、发展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也使整个国民经济连续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至197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传达贯彻活动。根据国务院指示，农林部于1970年10～11月向山西、安徽、天津、湖北、河北、江苏、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派出调查组，了解、检查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执行情况。1971年4月，农林部给中央的《关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情况报告》指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明确了学大寨要学根本，而刮大队核算风和收自留地风正是学大寨没学到根本的表现；广大农村干部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前一时出现的并队、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收自留地之风，已基本刹住；农田基本建设大发展，地方办“五小”工业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等等。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再次要求各地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强调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加强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国农业生产出现阶段性恢复和增长趋向。1966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7%，动乱的1967、1968、1969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是1.6%、2.6%和1.2%，而1970年、1971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5.76%和3.23%，1972年由于受到严重自然灾害，虽然粮食总产量比1971年减少3.9%，但仍比丰收的1970年有所增长，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5%。1973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达到8.3%。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连续多年下滑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社会总产值达到4776亿元，比上年增长8.6%；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社会商品零售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收支平衡。（5）

再次，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的农业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970年冬和1971年春，各地农村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共有近百万名干部、1亿多农民参加了农田基本建设。除普遍整地、修田、修渠、修塘、兴修小型水库和打井外，还兴修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黄河下游的引黄排灌工程，经过大规模开挖排水系统后，又逐步恢复引水，先后修建引黄涵闸70多处，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设，引提水能力达到4000多秒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0670平方公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在多年治淮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建成了一批大型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兴修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了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

北灌溉总渠等入海。这些工程的建成，大大提升了黄淮流域抵御洪涝旱灾的能力，使黄淮流域基本水利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文革”后期的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1〕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2〕《人民日报》1968年9月。

〔3〕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4〕当时指的五种人是：钻进领导班子里的坏人；被敌人拉出去，敌我不分，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坏人的领导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思想右倾保守的“老好人”；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人。

〔5〕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 《党史文汇》2007年第2期

~~~~~

### 【读史札记】

#### 九一三的谎言与费四金的诚实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读书随笔

• 书 吃 •

我一直在各种场合讲，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的历史事件是语焉不详的，而最大的历史事件疑团大概就是发生在一九五四年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和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前一事件因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中有薄一波的名字而无林彪的名字，而引发中共党内白区干部与军队干部矛盾激化，高岗将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结果刘周联手，加之陈云与邓小平两员大将杀出，高岗饶漱石败的一塌糊涂，最后落到高自杀饶被囚，所以后来有人说：高饶事件开了中共建政之后党内斗争的先河，也为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相比之下，林彪事件则更为扑朔迷离，至今仍有许多疑点无法揭开，如设国家主席、如二五六专机的神秘坠机。林彪事件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充满了迷惘、荒诞、神秘、陌生、复杂、沉重的感觉。这感觉直至今日仍挥之不去。

日前看到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共八百多页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作者舒云，曾参加聂荣臻元帅传记组的撰写工作，开始接触到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资料，并产生了探究谜底的兴趣。她查阅了大量档案，先后采访了一百多林彪事件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上至中共将领，下至林案受牵连者家属。特别是对军队系统人士的采访，包括前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毛家湾警卫负责人刘吉纯、林彪女儿林豆豆、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秘书关光烈和于运深、江青秘书阎长贵、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孙毅将军、王光美、陈励耘等多名当事人见证人，作者阅读大量相关资料，在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之后，写出了这本史料性与阅读性都极强的书，为这段历史的客观诠释做了独特而又深刻的注脚。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详述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从1970年8月底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冲突的起源，及所谓“设国家主席”之争的由来，到毛泽东“御驾亲征”的南巡倒林讲话；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的密谋，到林彪从北戴河别墅的出走；从周恩来指挥部署“全国禁空令”到林彪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中共虽然早已宣布彻底否定“文

革”，“文革”中大案小案基本上都翻了案，惟独“九一三”事件雷打不动，经过七十年代的清查和八十年代的审判，所有的脏水继续泼在林彪头上，但已经越来越无法说服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其结论越来越受到质疑。

费四金，前总参谋长黄永胜警卫参谋，是从广州军区四十一军一二一师调到黄永胜的身边，一九六八年黄由广州军区司令员升任总参谋长时，费四金也跟随他调到北京，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跟黄时间最长的。跟随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先后走了，而费四金也准备交班，调去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而前来接班的警卫参谋小汤也基本上接手工作了，只剩下一些经济账还没交，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了，没想到晚了几天遇上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就是关押和审查，就再也没走成，本来准备结婚的费四金，结婚证也领了喜糖也买了，甚至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了，却被突然关押起来，这一关押就是四年，出来时，喜糖都长了毛。

“四人帮”时代的中央专案组将费四金看做是“重点”，觉得可以从费四金口中得到很多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抱个大金娃娃”。专案组查来查去只查出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会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呢？！专案组不死心，查来查去不知怎么查到9月12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于是要求费四金证实。从某方面来讲，费四金可以说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了，黄到哪里他跟着到哪里，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前一天见了林立果，就可以证明黄与林立果的“小舰队”有勾结，而一旦费四金证实这一见面活动，黄永胜再怎么否认也无济于事，反而证明黄永胜和“两谋”（即谋害毛和南逃另立中央）有关。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专案组逼问他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只是以军人的忠诚，每小时每分钟甚至每一秒地回忆那一天黄永胜都做了什么。专案组说黄永胜在九月十二日去了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费四金一口就否认了，他说黄永胜那天没去京西宾馆，也没在别的地方见林立果，他肯定道，林立果我认识。专案组并不死心，又专门提审费四金多次，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的话，就会顺杆爬，反正黄永胜倒台了，泼污水的人多了，再多泼一盆又算得了什么，但是费四金并没有昧良心，他说：黄永胜没有见林立果就是没有见，我是党员，又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能做伪证。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也不是不明白做伪证的好处，不仅可以马上获得自由，还会有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如果自己坚持说真话，自己的结局将会很悲惨。但费四金坚持：就是开除自己的党籍军籍，也应该有良心，不能说假话。

专案组找来了京西宾馆的干部和服务员，众口一词的说他们那天（在京西宾馆）看见黄永胜接见了林立果，还拿出了当天的值班记录以佐证。而保卫干部出身的费四金一眼就认出，这值班记录不是原始笔记而是事后补记的。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连字迹也是一样的，一眼就可以认出是同一个人写的，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个记录）是事后追记的，而不是原始记录。最后，连纪登奎也出来做费四金的工作：别人都揭发，怎么就你不揭发？！这个话很严重了，又是中央领导亲自来说的，这个后果费四金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更恪守自己的良心，更恪守不能说假话做伪证的道德基准。他对纪登奎说：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也并不认识，我没理由保他；但是，也绝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了事就墙倒众人推，而去落井下石，把没有的事说成有，如果黄永胜九月十二日见了林立果。我绝不会包庇他。

不管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坚持黄永胜没有在九月十二日接见林立果的事实。也正是由于他的坚持讲真话，不仅在“四人帮”时代的专案组没能给黄永胜扣上“两谋”的帽子，就连后来审判“两案”，也无法写上这一条。党史专家王年一认为，比起某些人，费四金很了不起，坚持了正义和公正。一人之诚实，不仅救了黄永胜，而且救了很多。费四金不过是一个小干部，但他的品质优于很多人，可敬可佩！

而在中共历史上，说假话几乎已经成了每个政治运动来临之际，保存自己的基本常识，这种“基本常识”虽然不能保一世平安，但也起码能避过当下政权的迫害，于是我们说假话去污蔑别人，说假话以夸耀自己，说假话歪曲历史，说假话欺骗后人。还是说回来“林彪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这一事件时说“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就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彪在届中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这个文件关于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设国家主席怎么就成为罪行？林是党内的二号神，是九大里写进党章的副统帅，他为什么要向党进攻？陈伯达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前组长，中共领导阶层的第五号人物，怎么跟着林彪搞到一起去了？！为什么后来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时候又把陈划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中？中央文件里说陈伯达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这种人又怎能几十年给“伟大领袖”当秘书？怎么能当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对林彪集团各个人物的历史做大肆揭露，打击的不仅是那几个人的威信，而是党的本身的威信。林彪被说成早就对革命没有坚定信念，在党内斗争中数次反对毛的人，而且他的战功也是假的，他不会打仗，胆小怕死。如果真的是真样，为什么毛要把这么一个人捧成赫赫有名的元帅？怎么会把他抬到接班人的位置上去？难道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最有力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吗？林彪的心腹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以及林的夫人叶群，被说成是十分无能、工作欺上瞒下、生活腐朽透顶、荒淫无耻之徒，这些如果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为了证明林彪集团确实反对党，反对毛泽东本人，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以此证明林彪一伙的政变是早有预谋的，在这份文件中这些中共高级军官十分恶毒的攻击了现行制度，攻击了中共各项政策和毛泽东本人。当年听到这份文件传达的很多人惊奇的发现，文件中的很多话是真的，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原以为自己或多或少存有的类似的思想是大逆不道或危险的，但突然看到，原来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早就这么看，而且看的更透彻，说的更明白。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的作者舒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出了三十二点疑问，这三十二点疑问可以说句句在理，从客观、真实、理性的角度出发，揭去了这一神秘事件上所掩盖的谎言，认真、细致、有条有理的梳理大历史事件中的细微末节，利用亲历者的口述和已出版发现的材料，来清理、辩驳、分析其中的疑点。这种疑问，对整个近现代史、对中共党史、亲历者和后来人，都是有极好的作用的。我个人希望，更多的疑问才会引起更多思考，多思考才会建立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中的谎言不同的结论，在谎言中保持个人诚实冷静的品德，这，是最关键的，也是当下中国人文素质中最缺失的。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